

王章维 徐胜萍 卫金桂

著

「五四」与中国现代化

学出版社

“五四”与中国现代化

王章维 徐胜萍 卫金桂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四”与中国现代化/王章维等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5
ISBN 7-303-05122-8

I. 五… II. 王… III. ①五·四运动 (1919) - 研究
②现代化-思想评论-中国 IV. K261.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028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 字数: 235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15.00 元

序

——“五四”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我的学生王章维多年从事五四时期历史研究，在文章中常提出一些见解，确有深度和新意。他在指导研究生时，也要求学生从新的角度研究问题。如他指导学生研究五四时期科学技术发展并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写成的文章，就是一篇好的硕士论文。近期，王章维和他前几年毕业的学生徐胜萍、卫金桂一起，写了一本书，题名《“五四”与中国现代化》。他们要我写序，并就此问题说点我的想法。

把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并不是本书的发明，因为前几年学术界就已经提出来了。在我和其他学者的一些文章或著作中，对此都做过论述和分析；在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史、革命史学位点，已把类似的问题，当作研究生的招生方向或研究生课程。可是，也有些研究者并不以为然，总觉得谈中国的现代化，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而把“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有点赶时髦之嫌。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在学术界取得共识，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所以，有必要借写序的机会，重申我的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进入社会现代化过程，是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虽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是直到鸦片战争之前并未形成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必要条件。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不可能进入社会现代化过程，而要想进入还有待中国社会的逐步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遇到了来自世界的麻烦，外国

资本主义势力大举入侵,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中国社会就被逼入现代化的范围。显然,这种社会现代化只能是被动的、消极的,而不是主动的、积极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现代化要受到多种力量的钳制和抵御。其中,既有不愿中国真正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外国侵略势力,也有害怕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中国封建势力,还有本能地拒绝社会现代化的因循守旧的小农经济势力。被动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只能是极其缓慢的,每走一步都要遇到很大困难,终究摆脱不了贫困、落后、挨打、受辱的境地。可见,在中国,要实现社会现代化,第一步就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也就是说,必须推翻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鸦片战争后,为了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民众进行了多次的斗争。这些斗争,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一种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行为,都对这个过程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如果以上分析是符合实际的,那么鸦片战争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出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无论起促进作用或起阻碍作用,都属于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范围,都能够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自然联系起来。这样,把“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联系起来,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在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以为,应该说五四运动是重要的转折点,五四时期是重要的转折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五四运动中,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这一方面,反映在爱国家、争生存成为全国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愿望和行为准则。爱国主义是在千百年中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在社会舆论、社会心理上都有牢固的根基。当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各种不同出

身、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的社会成员，都比较容易激发热情，挺身而出，投入战斗。五四运动中，从旧官僚到新军阀，从大学教授到小学生，从工农到商界、警察、狱卒、花界，从国内人民到海外赤子，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出自己对国事的关心和热情。此前，爱国主义虽然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所涉及的面还限于局部，与五四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相比差得很远。另一方面，爱国主义的升华还反映在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有很大提高。虽然在五四运动中不少人对美国政府仍抱有幻想，但随后不久，先进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就达到新的质的飞跃。五四时代留下的爱国主义传统，始终激励着后人为了民族解放和富强而奋斗。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能够团结一致为实现由被动社会现代化转向主动社会现代化奋斗，靠的就是爱国主义。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能够把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靠的仍然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始终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精神支柱。

第二，五四运动是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介。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奋斗，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和作为这一革命的领导者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始终没有成功。斗争的结局表明，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不能不落在新兴的具有彻底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的肩上。五四运动后，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踏上了新的征途，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

为中介,五四运动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的桥梁,使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没有中断或停滞;使新的革命把旧的革命中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在总结旧的革命的血的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新的前进方向,从而带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新的希望。

第三,五四时期找到了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理论武器。现代化事业必须有现代化理论做指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虽然曾经指导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实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却显得软弱无力,因而迫使中国先进分子不得不寻找新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辛亥革命的失败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坚定了中国先进分子弃旧寻新的意识。五四运动后,人们的思想得到极大的解放,热衷于从国外引进各种学说,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途径和方法。这些学说,概括起来,不外两大思潮,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对民主主义已经产生怀疑,由于已经看到了民主主义的缺陷,一部分先进分子力图赋予民主主义以新的内容。这种新的内容的特色之一,是把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或者说是用社会主义的长处补救民主主义的短处。当然,也有不少人仍向往原来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诸如“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医学救国”乃至“体育救国”、“音乐救国”等等。这些对于启发人们的觉悟,帮助人们在各自岗位上为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努力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整体上说也都无力承担指导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任。五四运动后,人们对社会主义很感兴趣,希望由此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出路。当时,传入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学说五花八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一开始,人们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还处于学习、研究、比

较、选择的阶段，谈不上究竟信仰哪一种。不过，相当多的人很快就被空想性的、以和平改造为特色的学说所吸引，而对以阶级斗争为社会改造手段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觉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缺陷，主张用互助精神补其不足。之所以如此，是同中国的某些文化传统，同小生产的经济基础、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及知识分子耽于幻想、自命清高的特点有关系的。五四运动后不久兴起的工读互助活动，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当然，空想不可能变成现实。工读互助团以及类似的实验都失败了，迫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把理想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于是，一部分先进分子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决心走俄国人的路。这种选择不是轻率的，而是经过多种比较、鉴别之后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年会上说得十分中肯：“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性质为多”。这个结论，反映了当时的客观事实。这种选择的结局证明，五四时代的部分先进分子没有走错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最高层次的现代化意识形态。以它来指导中国社会现代化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即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由这两种理论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第四，五四时期为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各方面的准备。现代化事业必须有现代化政党来领导。近代中国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政党，但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前，能够称得上现代化政党的只有中国国民党。这个党在孙中山领导下，曾努力为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而奋斗，并立下了大功。然而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党开始涣散了，无力再担此重任，不得不让位给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兴无产

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但它的准备工作却始于五四运动之后。建立一个现代化政党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客观条件提供了这种可能之外，主观条件也必须具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没有五四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没有机会使新兴的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得到锻炼，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广泛传播，就没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就没有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或者说，没有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要推迟，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必定要推迟。

第五，五四时期倡导的现代化意识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现代化事业只能由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人去完成。所谓现代化意识，就是说要求人们的意识中具有开放性、进取性、创新性的特点。具体说，开放性就是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取性就是要努力向前，不断进步，有所作为；创新性就是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立于时代最前沿。有了现代化意识，才能导引出现代化思想，也才能在实践上做出符合社会现代化要求的贡献。否则，不但自己不能提出现代化思想，而且对别人提出的现代化思想也难于理解和接受，甚至在实践上做出不利于社会现代化的事情。五四运动乃至整个五四时期在实践上体现出来的开放性、进取性、创造性极为突出，人们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给以往的封闭的、保守的非现代化意识以极大的冲击，使头脑中的现代化意识开始不断增强。其所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先进分子，而且一般民众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而这种影响力远远大于以往几十年的总和。这样，就为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广泛的群众思想基础。就是说，从那个时候，现代化意识开始不同程度地进入人们的头脑。这必然要削弱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抵御力量，增强社会现代化的推进力量。不仅如此，由于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中

那些站在斗争最前线的先进分子有较强的现代化意识，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起就不是封闭型、保守型的政党，这对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伟大成就是至关重要的。

以上几个方面是从宏观角度分析“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至于从微观的角度看，还有许多具体内容，这在本书中已有详细论述，就不再多说了。

说到本书，我以为其主要的优点在于角度新。以往研究“五四”的书和文章实在太多了，几乎所有关于史的学科都去研究。在这些研究的成果中，确有一部分是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的，但究竟所占数量还不甚多。只有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才能赋予新的含义，才能突出其现实意义。本书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以丰富的、准确的史料描述和评论五四运动和五四时期的若干重要问题，说明“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对于“五四”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上一些话，有点为自己的学生吹牛之嫌，其实我并不认为本书毫无缺点，这本来就不可能，只是从总体上肯定其突出的优点。当然，无论是长处还是短处，都需要读者给予更恰当的评价。

张静如

1998年10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五四”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张静如 (1)

一、从民主思潮到民主政治

——“五四”追求的现代政治理想..... (1)

(一)“五四”高扬的一面旗帜..... (1)

(二)“五四”追求的现代政治理想..... (8)

二、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

——“五四”与中国人的新世界观 (14)

(一)进化论的影响..... (14)

(二)对唯物史观的选择..... (17)

三、从“音乐救国”到革命救国

——“五四”救国论的启示 (27)

(一)五花八门的救国论..... (27)

(二)“五四”救国论的启示 (48)

四、从“欧化”到“以俄为师”

——“五四”开启的政治新走向 (53)

(一)对西方梦幻的破灭..... (53)

(二)走俄国人的路..... (58)

五、从科学主义到科学实践

——“五四”与中国科学的现代化 (71)

(一)新思潮和思想解放的推动..... (71)

(二) 教育改革和文学革命的影响·····	(92)
(三) 科学现代化的意义 ·····	(100)
六、从“新民说”到思想革命	
——“五四”与中国人的现代化·····	(102)
(一) 对人的现代化的呼唤 ·····	(102)
(二) 对人的现代化的理解 ·····	(111)
(三) 推动人的现代化的方式和途径 ·····	(116)
七、从“教育救国”到教育革新	
——“五四”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	(126)
(一) 更新教育观念 ·····	(126)
(二) 改革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 ·····	(137)
(三) 引进和推广科学教育 ·····	(160)
八、从白话文到文学革命	
——“五四”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165)
(一) 再造国语 ·····	(165)
(二) 文学革命 ·····	(177)
(三) 文学现代化及其意义 ·····	(197)
九、从放足到服饰革命	
——“五四”与中国社会习俗的现代变迁·····	(204)
(一) “五四”社会习俗的现代变迁·····	(204)
(二) “五四”社会习俗变迁的特点·····	(218)
(三) “五四”社会习俗变迁的现代化意义·····	(220)
十、从求生到求道	
——“五四”与留法勤工俭学潮·····	(221)
(一) 留法勤工俭学潮的兴起 ·····	(221)
(二) 留法勤工俭学潮的意义 ·····	(233)
十一、从亲身经历到事后评说	
——五四时人论“五四” ·····	(235)

（一）论“五四”意义	（235）
（二）论“五四”名流	（248）
（三）论“五四”之弊	（262）
后记	（273）

一、从民主思潮到民主政治

——“五四”追求的现代政治理想

（一）“五四”高扬的一面旗帜

争取民主，是五四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民主思想、民主理论在当时广泛宣传，蔚然成风。而民主思想、民主理论的宣传，归根结蒂是为了改造陈腐的旧社会，创造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①因此，民主思想与民主政治成了“五四”时人追求的政治理想，成为“五四”高扬的一面旗帜。

五四时期，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虽然自晚清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西方民主思想已开始传入中国，如康有为在甲午战后已经认识到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指出“各国行宪法”乃是近世的趋势。^②但康有为时代的民主只是依附于封建君权的一个附属物，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目标。1904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民主、民生”的三大主义，形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体系，开始把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最高目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

① 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1919年，第1卷第1号。

② 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2000年封建专制制度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起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中华民国，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一次在中国得到实践。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轻易地篡夺，致使“1912年成立的共和国只是在宪法上被确立起来了”^①，“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②。中国“虽然挂了代议的德谟克拉西的招牌，实在尚是神治的、军治的、官治的政治，和民治的政治，相去尚是很远很远的。”^③中国人民“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④现实政治使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五四”精英们认识到，民主政治之所以在中国难以确立，乃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⑤“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益之感而有所取舍也。”“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⑥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民主政治，必须有待于人民的“最后之觉悟”。为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时期的进步思想家，高擎“民主”的大旗，为追求民主政治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建立了所谓的民国，但与民主截然相对立的封建专制主义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封建的纲常名教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正所谓“皇帝虽退位，而人脑中的皇帝未退位。”“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

①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② 毛泽东，《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湘江评论》，1919年，创刊号。

③ 仲九，《德谟克拉西的教育》，《教育潮》，1919，第1卷第1期。

④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1916，第1卷第6号。

⑤ 《湘江评论》，1919年，创刊号。

⑥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缺乏深刻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专制政治统治。因此，要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就“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①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灵魂是儒家学说，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道德就是孔孟之道。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把孔教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封建军阀袁世凯也不例外。袁世凯篡权以后便复辟尊孔。更有康有为及孔教会等要求北洋政府“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封建复古逆流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将斗争的锋芒直指孔教及其纲常伦理学说，以张扬民主的旗帜。他们说：“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② 他们指出：孔子之道是代表封建时代的精神的，和现代社会生活及自由平等精神绝不相容。陈独秀认为，“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③ 孔子之道“所谓保民，所谓仁政，已非今日民主国所应有，而当时实以为帝主创业之策略”。^④ 他指斥孔教“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⑤ 李大钊尖锐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而“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⑥ 他们呼吁，要建设现代国家，“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

①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1917，第3卷第3号。

②④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新青年》，1917，第3卷第6号。

③ 陈独秀。《孔子之道现代生活》。《新青年》，1916，第2卷第4号。

⑤ 陈独秀。《答俞颂华》。《新青年》，1917，第3卷第3号。

⑥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甲寅》，1917年1月30日。

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孔教是以“三纲”为核心的礼教。三纲学说奠定了君权、父权、夫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是封建道德的基础。陈独秀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所谓忠、孝、节“皆非推人及己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②其实质“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③。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将吴虞，抓住儒家的“孝悌”与封建家族制度的关系，对封建宗法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这篇文章中，论证了“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相联结之根干。”“孝为百行之本”，“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孝是忠的基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未之有也。”揭露了“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李大钊揭示了中国两千年来，“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

① 陈独秀。《宪法与礼教》。

②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1916，第1卷第5号。

③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1916，第2卷第3号。